

【本期论题】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赵春明，陈开军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动因、投资区位选择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但仍存在投资总量偏小且波动较大，投资行业布局不尽合理，投资的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投资的国际风险加大等问题。应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培育和建设一批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与全球公司，进一步强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协调和共振效应，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 高质量发展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9；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20) 02-005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14ZDA08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17BJL1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20YJA790094)。

[作者简介] 赵春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陈开军，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对外贸易与投资。

DOI:10.19625/j.cnki.cn44-1338/f.2020.0026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已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任务。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式折射着我国经济深层次的转型升级。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典型特征，是在渐

进式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廉价要素与引进外资相结合，广泛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大进大出驱动经济增长。虽然近些年来这种低端嵌入国际分工的格局得到了扭转和改观，使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得持续攀升，但总体来看，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距离完全实现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还存在差距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外贸易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显现。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全球总需求不振，经贸摩擦加

大,国际价值链分工趋势放缓,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科技创新为国际贸易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模式和挑战。从国内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抬升了要素成本和环境约束,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中、高技术产品领域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尚待进一步提高,地区贸易不平衡突出,在世界市场上品牌产品占比偏低,同质化竞争仍较为普遍。为稳固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必须加快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培育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在推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整合利用全球资源,加快工序流程再造,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布局全球生产和市场网络,从而带动我国产品、技术、标准和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1.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首先取决于投资动机,动机不同,促进作用也不同。联合国贸发会议根据投资动机,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区位多选择油气资源、矿藏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以绿地投资或并购投资为主要方式,获得价格便宜供给充足的自然资源,满足母国生产物资进口需要,降低母国在国际市场采购大宗资源过程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促进母国资源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区位主要位于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投资于制造业或服务业,通过规避东道国贸易壁垒或其他障碍,开拓贸易对象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资源和销售网络。这类投资还可以主动适应东道国市场需求偏好,改进自身产品设计,提升出口产品结构 with 质量;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区位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利用东道国经济体制、市场结构与制度组织安排的优势,实现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构筑全球生产网络,将生产工序与东道国优势资源相结合。这类投资不断将低增加值和劳动密集型工序向

外转移,促进母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不断攀升,带动贸易快速发展;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也被称为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其投资区位主要位于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类投资更加主动地嵌入世界知识技术集聚区域,以绿地投资、并购或技术合作方式展开,利用东道国技术知识、生产工艺、品牌价值、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提高母国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

2.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其次取决于投资区位,区位选择不同,促进作用也不同。根据区位选择和流向,可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是投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如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投资,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则是投向经济比我国更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资产利用动机。根据小岛清(Kojima, 1977)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贸易一样也遵循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当国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要素价格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顺次地将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或产品,转移至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生产并出口。作为包含资金、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国际要素流动,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与对外贸易互补,强化双边贸易往来,更重要的是,随着母国边际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展开,母国比较优势会动态演化升级,产业结构表现从低技术层次向高技术层次的转型升级,相应地,对外贸易结构也表现为出口更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大量进口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贸易结构得到优化,促进母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为母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自身优势和东道国各类优惠政策展开投资,通过投资开拓海外市场,获取垄断利润,这为母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资金支持。例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进行制造业海外投资的同时,对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航空航天、新材料及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促进了这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

提升。

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产寻求动机。由于缺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所有权、内部化和规模经济方面的垄断优势，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利用母国与东道国技术要素密集度负向落差，投向发达国家，寻求战略资源，学习先进知识，从而培育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属于探索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对外直接投资参与东道国技术研发，之后通过子公司与母公司天然联系，源源不断地将技术前沿动态信息外溢至母国公司，这种外溢效应可以促进母公司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伴随着行业内的竞争和模仿，这种技术溢出作用范围会进一步扩散。借助于不同产业之间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吸收外溢技术的产业高端化后，会对上游产业投入品技术及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会引致下游产业更加注重产品创新和技术投入，进而推动整体产业向高端化发展。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还会引起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和要素相对收益的变化，导致边际产业的收缩或转移、知识技术密集产业的快速扩张，从而推动产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从东道国的角度看，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顺利实现向母国的技术溢出，取决于东道国的基础要素和研发要素。基础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市场规模、政治经济制度等，研发要素包括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研发资源投入和研发密度等。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基础要素并不敏感，研发要素是其考虑的关键因素。例如，高科技跨国公司往往将海外研发机构创设在世界卓越中心，就是因为这类中心具有充足的科研要素、高科技产业集群和知识技术外溢的广阔空间。从母国的角度看，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除了取决于母国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外，还取决于母国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吸收能力。母国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吸收能力越高，与逆向溢出的匹配程度越一致，逆向溢出的本土转化和创新能力就越强。

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关联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取决于产业关联效应。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母国投资产业成为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产业关联效应的发挥会提升母国价值链分工地

位，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变迁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关联效应有助于母国企业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分工链条升级。工艺升级是母国企业价值链攀升的第一步，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使之深度嵌入价值链分工环节，以更低成本接近生产工艺前沿，直接利用东道国先进研发要素，提高研发、采购、运营等生产过程的工艺水平。在工艺升级的基础上，面对发达国家市场更高的产品质量和标准要求，母国企业会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或质量，包括开发新产品或改造已有产品，其参与分工的环节会进一步向研发设计、品牌推广、物流仓储、售后服务等延伸，促进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此类升级将进一步降低企业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促进企业向分工链条高端攀升。

另一方面，面临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风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克服高额投资成本，增强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要母国相关产业的支撑。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向关联效应，表现为投出产业对国内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及新产业的规模刺激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导致对国内上游产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更大，刺激上游产业规模扩张，同时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要求配套上游产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促进国内上游产业的高级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便产生了明显的上游产业带动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后向关联效应，表现为提高母国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生产转移到国外，当地生产并返销国内，使母国更加专业化于高端生产环节的研发与生产，有助于提升母国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促进贸易发展。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不仅体现为简单数量关系，更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投资动因、投资区位选择及产业关联影响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促进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不同投资动机，促进作用机制不同，但同时又都会受到投资区位的影响。契合比较优势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本国即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至东道国，为本国新兴产业发展拓展空间，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高度化。这一过程正如攀爬对外贸易质量阶梯，在对外直接投资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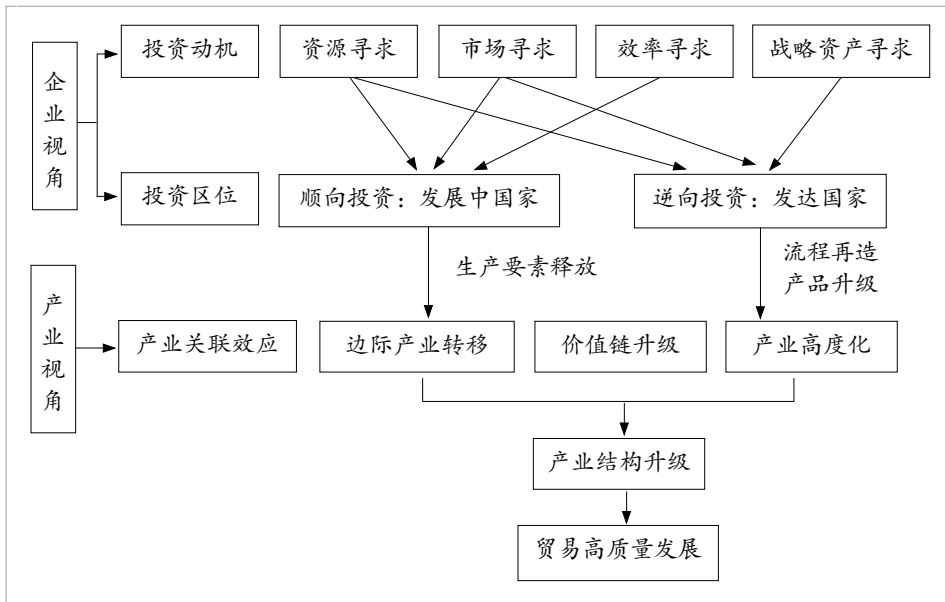


图1 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时，生产和出口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李嘉图—俄林型商品，在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生产和出口由竞争优势决定的波特—克鲁格曼型商品。逆梯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母国吸收能力的作用下实现本土生产技术的创新，引致生产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投资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中国资本的全球影响力正愈来愈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1982年的0.4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430.4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25.19%；存量从1982年的0.83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822.7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2.32%。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世界排名，分别从1982年的第29位和第48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波动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初始起步阶段（1979—1991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确立，欠发达条件下呈现国内储

蓄与外汇“双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管制严，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缓慢。

调整发展阶段（1992—2000年）。这一阶段，对外投资逐渐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也因此迎来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2年的93.68亿美元，累积增长为2000年的277.68亿美元，存量规模增长了近3倍。

高速增长阶段（2001—2016年）。入世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走出去”战略出

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外投资的国别和产业覆盖率不断扩大，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向沿线国家投资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这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超越发达国家，2015年和2016年蝉联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家。

高质量增长阶段（2017年至今）。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对外投资方向，推动对外投资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我国政府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市场主体对外投资更趋成熟和回归理性。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投资结构和质量效益明显优化。在全球经贸摩擦加剧、投资增长乏力、主要国家或经济体加强投资审查的条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托制度与政策优势，发挥全行业、全动因比较优势逆势上扬，2018年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上升至14.1%，创历史新高。“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家成为投资新增长极，以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为龙头，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和行业布局调整优化^①。

总体上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典的国际投资理论（Dunning, 1971, 1981），但也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作为对

^① 数据取自《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外直接投资的后发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而增长，但增长阶段性明显，波动性较大，政府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造成这种波动的重要原因。其次，在投资行业分布上，初始时主要集中于以商务服务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第三产业，寻求海外市场的开拓。随着投资的累积，逐步集中于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第二产业，以投资带动贸易，在境外设立生产加工制造基地，进行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当国内经济转型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时，开始转向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金融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在海外寻求战略资产，获得先进技术。再次，投资区域的分布，在投资“从无到有”阶段，主要为我国香港地区和亚洲国家，以缩短投资的心理距离和经济距离，降低营商环境陌生导致的高额成本和投资风险；在投资“从有到多”阶段，投资经验不断积累，开始增加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如对欧盟、北美等市场投资，以获取这些国家的战略性资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取得巨大发展与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1. 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偏小且波动明显

虽然我国在投资流量和存量上已跃居世界第二和第三位，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还不相称，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业绩指数为0.8，存量业绩指数为0.39，均小于1，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不相匹配^①。另外，受发展中国家经济实际限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更为敏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走势和国内经济体制、经济政策改革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较大的影响，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2.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不尽合理

我国虽然实现了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但行业结构层次仍然较低，竞争力偏弱。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投资规模微小，第二产业投资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在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的采矿业存量规模最大，受东道国资源、环境审查限制，近年来采矿业持续

投资乏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以传统装备制造业投资为主，高端、智能、绿色制造业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第三产业中，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等传统服务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占比偏低，特别是信息传输、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仍较缓慢。

3.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地区结构分布不均衡，其中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亟待提升。自2014年起，地方投资逐渐代替中央投资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但地方投资70%以上来自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增长率上都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全国前十大对外直接投资省份几乎都位于东部地区，其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接近80%。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仅有河南、重庆、成都等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为突出。

4.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加大

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投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很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构，欧美发达经济体为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在经贸领域掀起保护主义浪潮，国际投资体制趋于碎片化。一些国家出台了以环境保护、国家安全和反垄断审查为由的更为苛刻的投资限制政策措施，且审查行业范围不断扩大，关键基础设施和高科技行业成为审查重点。这些措施使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我国大力推进的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及拉美地区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也频频受到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及东道国政权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高质量发展正面作用的发挥。我国对外

^① 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由联合国贸发会议于2004年提出，该指数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世界占比与该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占比之比，用于反映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规模的适应程度。该指数小于1，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称；该指数等于1，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国际经济地位相称；该指数大于1，则表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更为突出。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五个优化、三项建设、五个转变”^①。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通过投资动因、区位分布及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我国贸易优进优出，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举措。但受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的制约，这一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从投资动因来看，战略资产寻求型的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产业结构、促进贸易发展最为有效。但近年来，美、英、法、日等国纷纷加强对科技领域的开放限制，对能够引领下一代科技革命的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科技、航空航天、移动通信等行业实施严格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我国企业面临提高出口技术含量和质量本土化挑战。从投资区域来看，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利用经济势差获取东道国丰富资源、原料和中间品，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利用后发优势获取技术溢出。我国对“一带一路”、非洲及拉美地区的顺梯度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总量偏小，且不断受到东道国以环境保护等为由的不合理限制，资源获取和中间品进口规模增长缓慢。我国对亚洲地区的顺梯度投资总量虽然较大，但地区集聚现象明显，仅投向香港地区的资本就占到投向亚洲地区资本的50%以上。这种投资集聚状况既不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也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发挥。从产业关联来看，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欧美再工业化战略下，全球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导的产业转移放缓，制造业回流加速，全球价值链模式发生变化。在新模式中，服务业在价值链中作用增强，使价值链、供应链及资金链朝着更短、更快、更智能的方向发展。这种短链化趋势促使产业链条主要围绕区域中心进行融合，产业上下游的关联效应缩小。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链格局还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模式，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受到限制。

四、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和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在深度开放下推进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结合，协调贸易强国和“走出去”战略的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对外直接

投资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

我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核心在于相当部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应持续加大对合法合规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制定优惠性政策措施，引导战略资产寻求型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鼓励大型装备制造、通信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产业，以关键性技术突破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和高科技公司的并购重组，有效利用全球优质研发资源，推进国际研发投资开发开放与合作。

（二）继续大幅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沿线国家及区域的战略对接，也成为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正在从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加工制造、农业等传统领域，向绿色经济、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经济领域进军。因此，一方面，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继续对“一带一路”南线国家传统领域进行投资，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南亚及非洲转移，另一方面，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则应增加对沿线欧洲工业化国家新经济领域的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三）重点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我国已采取一系列战略与举措，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对西部、中部和东北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今后，在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投资企业示范效应的同时，要进一步落实这些战略与政策，最大程度地利用好政策红利，弥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地理区位上的不足，构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

^① 即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外贸经营主体、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贸易促进平台建设、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实现我国贸易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营商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转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由遵守、适应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规则制订转变（参见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

发展局面，从而总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四）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生力军。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非公有制经济控股投资流量超过公有制经济控股的投资流量；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①。要继续引导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构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支持体系，为民营企业纾忧解困，包括投资担保、投资基金等，通过差异化融资支持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另一方面，构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技术支持体系，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降低风险。按照《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推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合规经营，提供充分的法律法规、国际条约、经贸规则、典型案例等服务信息，推动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调发展。

（五）培育一批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

跨国公司是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主体，这类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贸易投资双向促进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凭借贸易经验，比一般企业更能克服海外市场的进入障碍，增加投资成功概率。另一方面，其投资又带有明显的贸易促进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上，更多地体现在进出口产品多元化上。针对国有企业，应加大改革力度，深度推进行业内重组、联合研发、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措施，形成大型跨国公司集团；针对民营企业，应鼓励兼并收购，整合优势，提升企业规模与竞争力，形成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在此基础上，努力打造和建设一批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打造和建设高级形态的全球公司，为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助推器，将是我国企业今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努力目标和发展方向。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基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全球知名品牌建设，着力打造品牌促进服务平台、品牌推荐服务平

台、品牌保护服务平台和品牌信息服务平台等品牌建设平台，助推和缩短中国企业成为全球知名自主品牌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多方协同努力，推进我国企业由“走出去”转变为“走进去”。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很多企业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走出去”了，不少企业还进一步精耕海外市场，深入扎根于投资目标国，实现了真正的“走进去”，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但总体而言，我们在这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任重道远。

（六）进一步强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协调和共振效应，推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从传统的“微笑曲线”走向“彩虹曲线”

“彩虹曲线”所呈现的是，消费者从工序链条的末端提到了起始位置的发起点，消费者从以往的简单需求者变成了产品生产全周期的参与者，技术研发和“云端”服务则处于链条的中游环节，下游则是生产制造和配送环节。在这种情况下，附加值呈现出了两端低、中间高的特征。这反映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研发对象不仅包括产品实体，而且还包括互联网服务，它所提供的智能服务和共享服务，贯穿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在产品研发环节成为增加值最高的环节。为此，应该充分结合我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新优势，通过跨国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全球市场上优化产业布局，搭建全球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新平台，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从而在构建中国自身区域价值链的基础上，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地嵌入全球价值链。

（七）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的转化吸收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政府应继续完善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实现公共教育均等化发展；提高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并适当向高等职业教育倾斜；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搭建好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桥梁；积极发挥人力资本集聚区域

^①海关总署邹志武副署长在2020年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和《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的优势, 打造技术吸收再创新的高地, 重点推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健全人才流动机制, 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 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 从而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和高质的人力资源与条件。

[参考文献]

- [1] 戴翔, 宋婕. 我国外贸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及方略[J]. 宏观质量研究, 2018(09): 22-31.
- [2] 霍建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J]. 开放导报, 2019(02): 15-18.
- [3] 黄梅波, 李泽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40年: 动因及模式[J]. 东南学术, 2018(04): 80-92.
- [4] 江小涓. 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 赋能增长与改革[J]. 管理世界, 2019(12): 1-16.
- [5] 孔群喜, 王紫绮, 蔡梦. 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吗[J]. 财贸经济, 2019(05): 96-111.
- [6] 李梅, 柳士昌.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01): 21-33.

- [7] 裴长洪, 刘洪愧. 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 一个新的分析思路[J]. 经济研究, 2017(05): 26-43.
- [8] 汪丽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9(05): 56-71.
- [9] 韦恩·M·莫里森, 王宇. 中国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 历史与未来[J]. 金融发展研究, 2020(02): 43-46.
- [10] 杨挺, 陈兆源, 韩向童.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趋势与展望[J]. 国际经济合作, 2020(01): 13-29.
- [11] 姚树洁, 汪锋. 扩大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人民论坛, 2018(23): 84-85.
- [12] 张宏, 王宵, 潘雨晨. 中国OFDI对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为背景[J]. 亚太经济, 2019(04): 79-87.
- [13] 赵春明, 文磊. “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挑战与对策[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6(02): 40-44.
- [14] 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London: Croom Helm, 1978: 85-120.
- [15] Wang, J.Y., Blomstrom, M.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 Simple Mode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6):137-155.

How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s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Zhao Chunming, Chen Kaijun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s: OFDI affects the changes of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rade structure, and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through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China's OFDI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small total investment and large fluctuations, unreasonable investment industry layou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regions, and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risks of investment.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igorously develop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ultivate and build a group of world-lead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global companie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and resonance of China's OFDI an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Key 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eign Tr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收稿日期: 2020-03-13 责任编辑: 罗建邦)